

●王知津

中国图书情报学教育 20 年评述

摘要 80年代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特点是:图书情报学教育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以文科为主的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化;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尝试。90年代的特点是: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成为关注的热点;图书馆学核心课程逐步形成;课程体系从图书情报学向信息管理转移;图书情报学教育分化显露。存在的问题:未能正确理解“大情报观”,未能正确处理“情报”与“信息”的关系,未能慎重对待专业目录调整。参考文献 14。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情报学 专业教育 二十年回顾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In the paper,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s follows: in the 1980s, the government put emphasis on the edu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the simplistic model based on social sciences was changed into pluralism; an integr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as tried. In the 1990s,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as a focus; a core list of courses in library science was formed; the curriculum system was transformed from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n, the author analyzes some problems. 14 refs. .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view.

CLASS NUMBER G250

0 引言

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起,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进入空前的快速发展阶段,无论是办学数量和规模,还是办学质量和效益,都超过了历史的任何时期。主要标志有三:一大批高等学校设置了图书馆学专业,扩大了办学规模;恢复了情报学专业,专业特色日趋鲜明;确立了图书馆学专业和情报学专业的学科地位,这两个专业都拥有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

经过 20 年的发展,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面貌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21 世纪来临之际,回顾图书情报学教育走过的历程,总结经验和教训,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今后的目标和任务,对于进一步发展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1 回顾

1.1 80 年代

80 年代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具有 3 个特征。

1.1.1 图书情报学教育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1978 年 6 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会上,北大和武大共同确定了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方案,并决定协作编写教材。这次会议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0 年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提纲》建议教育部同文化部合作,共同办好现有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专业^[1]。根据《提纲》的要求,1981 年 9 月,教育部和文化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学教育座谈会”,与会的 9 所设有图书馆学专业的院校对加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改革我国单一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体制是当务之急。这次会议是我国第一次专门研究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会议,也是文科座谈会的延续和深化。

1983 年 4 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座谈会”,当时,全国已有 12 所院校设置了图书馆学专业,6 所院校设置了情报学专业,会议不但认真研究了人才需求、知识结构、培养目标和规格以及师资队伍建设,还讨论了教学方案和课程设

置^[2]。1983 年 9 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发展和改革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几点意见》,成为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指导性文件。

中国图书馆学会于 1985 年 7、8 月,在四川新都召开了“首届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学术讨论会和经验交流会”^[3],重点讨论了图书情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1986 年 9 月,国际图联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北京召开“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了信息时代图书情报学教育问题。这是首次在我国召开的国际性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会议,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4]。

1.1.1.2 以文科为主的单一办学模式转向多元化

80 年代前,图书馆学专业大多设在综合性大学,招生以及课程设置以文科背景为主。“教学内容注意社会科学多,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很不够;图书馆学专业知识的教学,大多停留在传统技术方面,对现代技术的研究晚了一些,对情报学的研究也重视不够”^[5]。为改变这种单一模式,不少院校大胆尝试。1979 年北大和北大分校等分设文理两科,北京大学曾安排 79 级和 80 级学生,前两年先到物理、生物、计算机、经济、历史、中文等系学习,后两年再回本系学习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专业课程^[6]。80 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和普及,各校陆续增设情报学系列课程和计算机系列课程。文理兼顾至今仍然是图书馆学专业招生和课程设置沿用的基本原则。

1.1.1.3 尝试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

1983 年 4 月,“武汉座谈会”使用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提法,这预示着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开始走上一体化的道路。

80 年代前期,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成为讨论热点,其背景是当时的图书情报界正在热烈讨论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问题,而图书情报学教育要服从于图书情报工作实践,这是理所当然、合乎逻辑的延伸。实际上,早在 1982 年就有人建议把图书馆学改称图书情报学^[7]。1978 年 7、8 月四川新都会上着重研究了教学内容的改革,提出要制定教学大纲,并确立了 10 门核心课程,这 10 门课程中包括科技文献检索、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情报检索。情报学课程开始渗入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情报学课程设置一体化或相互渗透的另一个表现是,情报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图书馆学专业

课程或派生课程。如文献^[8]所列的情报学专业必修课包括科技文献检索、科技文献管理、情报标引与检索语言、情报用户研究,分别对应于图书馆学专业的科技文献检索、分类与编目、主题标引、读者研究等。

80 年代图书馆学专业和情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出现了交叉和渗透的倾向。这意味着,以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为起点构建情报学课程体系,而图书馆学专业原有课程体系已经发展为图书情报学课程体系^[9]。

1.2 90 年代

90 年代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改革和调整”,具有 4 个特征。

1.2.1 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成为关注热点

经过 80 年代的迅猛发展,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然而,由于缺乏宏观控制和协调,也出现了各校之间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悬殊过大的现象。进入 90 年代,我国信息产业蓬勃兴起,国外图书情报学教育危机的扩大并波及到我国,特别是国家科委把“情报”改为“信息”产生的冲击波,促使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加快改革步伐。1992 年 8 月、1993 年 11 月和 1995 年 1 月,国家教委先后在武汉、湘潭和哈尔滨召开了 3 届“全国图书馆学系主任联席会议”。这 3 次联席会“确定了 90 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调,从宏观上、整体上引导和调控着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进程,并从而使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了规范管理和协调发展的新时期”^[10]。

我国大陆图书情报学教育界与台湾中华图书资讯学教育学会,先后于 1993 年 12 月(上海)、1994 年 8 月(北京)、1997 年 3 月(武汉)和 1998 年 3 月(广州)召开了 4 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教育的交流,对于加快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改革和构建图书馆学核心课程,跟上世界发展潮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1.2.2 图书馆学核心课程逐步形成

1992 年 8 月武汉联席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确定了图书馆学专业的 12 门核心课程,经过“湘潭联席会”后,这 12 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于 1996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的议题之一包括构建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而这个问题仍然是 90 年代的讨论热点。文献^[11]以第 1、第 2 届全国图书馆学系主任联席会议提交的教学计划为基础,对图书馆学专业必修课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各校的核心课程基本一致,也比较稳定。

1.2.3 课程体系从图书馆学向信息管理转移

90 年代初,关于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的讨论仍在继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现有的两个专业淡化、课程综合化。从图书情报工作的实际需要看,从几十年来的人才流向看,图书馆学专业和情报学专业很有淡化的必要^[12]。

80 年代国外出现了“信息资源管理”(IRM)的概念和理论,90 年代初,这个理论传入我国,与迅速发展的信息产业以及国家科委把“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的举动相结合,为新一轮的课程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特别是北大率先把系名改为信息管理学而引发的改系名风潮,使各校针对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在确保核心课程的基础上,纷纷对现有的教学计划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以便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人才市场接轨。与此同时,大多数院校都按国家教委专业目录(1993 年)增设了信息学专业,甚至有人建议用“信息管理”专业涵盖图书馆学、信息学(情报学)和档案学。

1995 年 1 月的哈尔滨联席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从会上各校提交的新教学计划看,传统课程进一步减少,信息类课程继续增加,且大部分已纳入“信息管理”专业新体系。这表明,图书情报学开始向信息管理的方向发展。这是在新的形势下继续的一体化。

文献^[13]提出信息管理学课程体系包括 7 个方面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强调实现课程体系的系列化和一体化。从信息采集、信息加工、信息存储与检索、信息服务与传播到信息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形成一套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不断深化的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在哈尔滨联席会后,该文献的观点基本代表了 90 年代后期课程体系改革的发展潮流。可见,90 年代我国图书情报学的一体化是“信息管理化”,接续 80 年代形成了“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的历史轨迹。当然,多数核心课程的地位并未动摇。

1.2.4 图书情报学分化趋势显露

随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应用,社会信息化的整体水平大大提高,图书情报机构的工作手段和服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图书情报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图书情报机构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及稳定,毕业生开始向非图书情报机构分流,政府机关、新闻单位、公司企业以及各行各业的信息中心、计算中心等逐渐成为接收图书情报学专业

毕业生的主要机构。特别是大批新型信息行业的出现,更使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从单一化转变为多样化,这就促使图书情报学教育重新构建适应性强的课程体系。

多数人认为,信息管理是图书情报学(也包括档案学)外延的扩展,也是继承和发展。从“图书情报学”到“信息管理”,改名的目的是期望通过“信息管理”这个外延较宽的名称,扩大原有图书情报学的包容量,拓展专业领域,增强毕业生就业的适应能力。然而,改名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图书情报学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外延得以伸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困惑和麻烦,造成预料不到的混乱。

后来形势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 1998 年 7 月教育部颁布的专业目录中,信息学(情报学)和科技信息(科技情报)与原有的经济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林业信息管理共 5 个专业合并成 1 个新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两个专业的独立地位受到挑战,而新专业的内涵和外延至今仍然很模糊,至少与我们所期望的信息管理的本意相差甚远。

第 2 个负面结果是使图书馆学专业与原情报学(信息学)专业分离。在新专业目录中,图书馆学专业隶属于一级学科“图书档案学类”,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隶属于另一个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两者分属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从而打破了原本已初具规模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的雏形。新专业目录规定的图书馆学专业主要课程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制约主要课程的设置差别也很大。

从“图书情报学”到“信息管理”,人们的主观动机是淡化专业和课程综合化,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发生了相反变化,即专业被分离,学科被分化,人们面对着尴尬的局面。专业分离后,原情报学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以至于失去了本来的学科意义,并与其他专业一体化;另一方面,图书馆学失去了情报学支援,仅与档案学为伍,产生一种孤独感,这对图书馆学发展很不利。

90 年代末期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分化与 80 年代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努力背道而驰。这是人们过于强调信息化以及对专业目录调整准备不足的必然结果。

2 思考

2.1 经验

2.1.1 争取政府支持,引起政府重视

20 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先后召开了北京座谈会和武汉座谈会等会议,并形成了有利于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的政府文件,这些会议和文件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具有指导作用。应当承认,政府支持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国情,绝不能失去政府的支持,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根据这一经验,很有必要尽快组建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目前很多专业都已经建立了这样半官方的权力机构(如档案学),并在各专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图书馆学专业已经存在多年,建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势在必行。

2.1.2 坚持系主任联席会制度

90 年代的 3 次联席会,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不但及时沟通了各校的做法和认识,还对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共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研究,解决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的走向进行了预测并统一了思想和行动,同时,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对保证图书情报学教育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至关重要。遗憾的是,1995 年后联席会中断了。在此,我们呼吁,尽快恢复例行的系主任联席会。

2.1.3 大胆改革,勇于创新

以文科为主的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化、尝试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构建核心课程和系主任联席会等一系列举措,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曾经创造过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辉煌。不改革就不能生存,不创新就不能发展,改革和创新始终是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主旋律。进入 21 世纪后,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的方向,不仅在课程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改革和创新,而且还要在专业设置、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改革和创新。

2.2 问题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来自原来 5 个不同专业,新专业的内涵和外延至今仍不明朗,其课程设置与原来的情报学也有很大距离。“由于照顾信息管理各专业的统一,另一方面却忽视了信息管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等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学科群问题。”^[14]1998 年 10 月在保定召开的“全国高校信息管理专业教育研讨会”就使人们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事实上,情报学外延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其独立学科地位的动摇,以至于丧失了该学科的本来意义,有可能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属,这对情报学的生存和发展十分不利。造成上述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在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

2.2.1 未能正确理解“大情报观”

提出大情报观的初衷是要把对情报学学科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科技情报学扩展到经济、管理、社会等领域,这个出发点非常正确。在“大情报观”下,情报的内涵没有变化,外延有所扩大,并不意味着把情报的内涵扩展到信息,从而使两者等同起来。但是,我们有些人对“大情报观”的“大”作了片面理解,以至于使情报无限地“大”到其他学科和专业上去了,反而使自己没有站稳脚跟。

2.2.2 未能正确处理“情报”与“信息”的关系

当今社会所说的“信息”,一种是指专指计算机处理,另一种则泛指人类社会交流。计算机处理是情报学的手段而不是研究对象,情报学不能混同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而“情报”改“信息”,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我们得到了眼前一些好处,但却失去了长远利益,总的来说,弊大于利。

2.2.3 未能慎重对待专业目录调整

在上一轮专业目录调整中,有关院系沟通和研讨不够充分,有些环节出现了漏洞,应当引以为戒。新的专业重组引发了一些新问题,如原已确认的情报学专业消失了;图书馆学、档案学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在信息科学群中没有体现出来,等等。应如何进行专业调整?我们认为,既要积极大胆,又要慎重稳妥。为此建议,在下一轮本科生专业目录调整前,应预先作好准备,提前拿出一套或几套方案。可以考虑把一级学科“图书档案学类”扩充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类”(或其他名称),下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3 个二级学科。以此与研究生专业目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以及《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取得一致。

3 结束语

在整个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追求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到 90 年代末又发生了两者的分化。从“一体化”到“分化”是前进还是倒退?需要我们冷静地认真思考。

我们对“情报”改“信息”有许多感触,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使情报学丧失了独立性并造成了图书情报学的重新分离。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最初的愿望,但我们却又不能回避这个现实。这种分离的消极后果,不仅使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夭折,而且可能使两者(特别是图书馆学专业)各自孤军奋战,分别朝不同的

方向发展,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

20 年来,正是由于这两个专业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才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打开一片光明天地。它们曾经以“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名称出现在本科生专业目录里,至今仍在研究生专业目录里占据一席之地。不仅如此,它们还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名称出现在《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和 200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在 200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管理科学学科代码》中,它们叫作“G03080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遗憾的是,它们偏偏在新的本科生专业目录中分家了。

90 年代前期,图书情报学教育开始朝信息管理的方向发展。90 年代后期,专业重组使图书情报学教育重新分化。人们企盼图书情报学发展成为信息管理的美好愿望被打碎,图书情报学教育走到了十字路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形势。

我们深信,历经艰辛的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工作者一定会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力量,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坚定信念,迎着新世纪的曙光,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4 黎盛荣,谢群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略(下).图书馆

论丛,1982(2)

2,3 刘凤泰.大力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侧记.高教战线,1983(7)

5 黄宗忠,张琪玉.图书馆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图书馆学通讯,1980(3)

6 肖东发.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 40 年(1949~1989).图书馆学通讯,1989(1)

7 关懿娴.改进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管见.图书馆学通讯,1982(4)

8 马费成.我国的情报专业教育——纪念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创建三十周年.情报学报,1986(3~4)

9,10 霍国庆,金高尚.九十年代我国图书馆学信息学教学改革的最初进展及发展方向.山西图书馆学报,1996(4)

11 钟守真.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构想.津图学刊,1998(1)

12 柯平.论图书馆学情报学课程的改革.河南高校图书情报工作,1991(1)

13 董小英.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转型及其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1996(1)

14 柳晓春,方平.中美图书信息教育改革与发展述评.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2)

王知津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图书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天津市.邮编 300071。

(来稿时间:2000-06-12)

(上接第 64 页)排序的副表,供增添和调整词号,以及防止重号之用。副表和一级词的分类索引对 SG 的维护与更新将提供方便,且将加强 SG 的族性检索。

5.4 SG 对文献数据库的适用性

SG 作为一种自动转换工具,比较适用于专业文献库的关键词检索。但它不大适用于综合性文献数据库。这是由于关键词中存在一词多义、同形异义和词义不明等现象,词量又不受控制,因而编好综合性的 SG 难度较大,维护与更新亦很不易。好在文献数据库正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像《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社会科学报刊篇名数据库》本来就是专业库,只是收录范围较大,所以它们的光盘版又采取分专辑发行的办法。因此我们选择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两门我们熟悉的专业,并在文献的语种上加以限制,是符合文献库的发展方向的。我们认为各专业都可以试编 SG,以改善关键词检索的效果,并在实践中提高其编制质量,使 SG 这一新生事物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琪玉.张琪玉情报语言学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 侯汉清,马张华.主题法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 陈光祚.论“中国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4)

4 陆宗城,孙茗.21 世纪的情报检索与主题标引的优化.见:21 世纪大学图书馆的新使命——庆祝北京大学成立 100 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方小苏,陆宗城.文献机检查全的新方案.图书馆杂志,1999(2):16~17,2

6 方小苏,陆宗城.标引词间等级关系和相关关系处理办法的比较.图书情报工作,1999(增刊):63~65

7 胡朝德,叶新明.网络时代情报检索语言的路向.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4)

注 本文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文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文献检索最优化研究》的最终报告。

陆宗城 浙江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授,主讲主题标引和图书分类等课程,出版专著 4 种,发表论文约 30 篇。通讯地址:浙江杭州。邮编 310028。(来稿时间:2000-08-07)